

湖岸
Hu'an

Douglas Hofstadter

[美] 侯世达 著

修佳明 译



I AM A
STRANGE
LOOP

我是个怪圈

最终，我们自我感知、发明自我，并被锁入一场叫作“我”的幻景，
是自我指涉的小小奇迹。

中信出版集团

I AM A
STRANGE
LOOP

Douglas Hofstadter

我是个怪圈

[美] 侯世达 著 修佳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个怪圈 / (美) 侯世达著; 修佳明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I Am a Strange Loop
ISBN 978-7-5086-9579-2

I. ①我… II. ①侯… ②修… III. ①科学知识—普
及读物 IV. ①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460 号

I Am a Strange Loop by Douglas Hofstadter
Copyright © 2007 by Douglas R. Hofstad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简体中文著作权 © 2018 清妍景和 × 湖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是个怪圈

著 者: [美] 侯世达

译 者: 修佳明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39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579-2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献给能理解我的姐姐劳拉

同时献给不能理解我的妹妹茉莉

致 丽兹·马圭尔

1958—2006

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出版方附记

作为基本图书公司多年来的老朋友，侯世达特意将本页留给我们，以纪念一位已故的编辑。

致谢

心灵是什么？心灵做什么？从10多岁开始，我就被这些谜题深深吸引，并潜心思索了几十年。我得出的结论，有一部分是来自个人的经验和独立的思考，同时我当然也受到了很多其他人的观点的深刻影响，这一直可以追溯到我的小学时代，甚至更早。

关于心灵、大脑、模式、符号、自指和意识这些交织缠结的话题，很多知名的作者影响了我的思考。以下，大致按照他们影响我的时间先后顺序，我列出了对我影响最深的作者的感谢名单：欧内斯特·内格尔 (Ernest Nagel)、詹姆斯·纽曼 (James Newman)、库尔特·哥德尔 (Kurt Gödel)、马丁·加德纳 (Martin Gardner)、雷蒙德·斯穆里安 (Raymond Smullyan)、菲佛 (John Pfeiffer)、维尔德·彭菲尔德 (Wilder Penfield)、帕特里克·苏佩斯 (Patrick Suppes)、大卫·汉堡 (David Hamburg)、阿尔伯特·哈斯托尔福 (Albert Hastorf)、艾舍尔 (M. C. Escher)、霍华德·德隆 (Howard DeLong)、理查德·杰弗里 (Richard C. Jeffrey)、雷·海曼 (Ray Hyman)、霍妮 (Karen Horney)、米克海尔·柏佳德 (Mikhail Bongard)、图灵 (Alan Turing)、格里格·蔡廷 (Gregory Chaitin)、斯坦尼斯劳·乌拉姆 (Stanislaw Ulam)、莱斯利·哈特 (Leslie A. Hart)、罗杰·斯佩里 (Roger Sperry)、雅克·莫诺德 (Jacques Monod)、特里·维诺格拉德 (Raj Reddy)、维克多·莱塞 (Victor Lesser)、马尔文·明斯基 (Marvin Minsky)、玛格丽特·波顿 (Margaret Boden)、特里·维诺格拉特 (Terry Winograd)、唐纳德·诺曼 (Donald

Norman)、艾略特·赫斯特(Eliot Hearst)、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莱姆(Stanislaw Lem)、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阿伦·威利斯(Allen Wheelis)、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罗伯特·阿克谢尔罗德(Robert Axelrod)、吉尔斯·法库涅尔(Gilles Fauconnier)、保罗·波茨(Paolo Bozzi)、杰赛普·隆哥(Giuseppe Longo)、瓦伦蒂诺·布赖滕贝格(Valentino Braitenberg)、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安妮·特丽斯曼(Anne Treisman)、马克·特纳(Mark Turner)和让·艾切森(Jean Aitchison)。这些作者的很多著作和文章都出现在参考文献中。多年以来,我有幸结识了其中数位,而我把与他们结下的友情视为生命中最大的欢愉之一。

就关系更加紧密的圈子而言,我与家庭成员、朋友、学生和同事之间的那些亲密交谈、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也在一生中不断影响着我。我也把这份感谢名单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列出:南希·霍夫施塔特(Nancy Hofstadter)、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劳拉·霍夫施塔特(Laura Hofstadter)、彼得·琼斯(Peter Jones)、罗伯特·柏宁格(Robert Boeninger)、查尔斯·布雷纳(Charles Brenner)、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迈克尔·古德哈贝(Michael Goldhaber)、大卫·波利肯斯基(David Policansky)、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因加·卡尔林内(Inga Karliner)、弗朗西斯科·克拉罗(Francisco Claro)、彼得·林贝(Peter Rimbey)、保罗·柯松佳(Paul Csonka)、大卫·詹宁斯(David Jennings)、大卫·加斯特曼(David Justman)、斯科特·布莱希(Scott Buresh)、西德尼·阿尔克维奇(Sydney Arkowitz)、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菲利普·泰勒(Philip Taylor)、斯科特·金(Scott Kim)、彭迪·卡纳瓦(Pentti Kanerva)、威廉姆·格斯皮尔(William Gosper)、唐纳德·拜尔德(Donald Byrd)、迈克尔·杜恩(Michael Dunn)、丹尼尔·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玛莎·梅雷迪斯(Marsha Meredith)、格雷·格罗斯曼(Gray Clossman)、安·特莱尔(Ann Trail)、苏珊·万德尔(Susan Wunder)、莫大伟(David Moser)、卡罗尔·霍夫施塔特(Carol Hofstadter)、莱纳德·夏尔(Leonard Shar)、保罗·斯莫兰斯基(Paul Smolensky)、大卫·里克(David Leake)、彼得·苏贝尔(Peter Suber)、格雷

格·胡波 (Greg Huber)、伯纳德·格林伯格 (Bernard Greenberg)、马雷克·卢果斯基 (Marek Lugowski)、乔·贝克 (Joe Becker)、梅拉尼·米切尔 (Melanie Mitchell)、罗伯特·法兰西 (Robert French)、戴维·罗杰斯 (David Rogers)、本尼德托·西梅米 (Benedetto Scimemi)、丹尼尔·德菲丝 (Daniel Defays)、威廉·卡夫纳 (William Cavnar)、米歇尔·加斯尔 (Michael Gasser)、罗伯特·古德斯通 (Robert Goldstone)、大卫·查尔默斯 (David Chalmers)、加里·麦克格劳 (Gary McGraw)、约翰·雷灵 (John Rehling)、詹姆斯·马绍尔 (James Marshall)、王培 (Wang Pei)、阿吉尔·瓦尔茨 (Achille Varzi)、奥利维尔罗·斯托克 (Oliviero Stock)、哈利·方达里斯 (Harry Foundalis)、哈密德·艾克比亚 (Hamid Ekbia)、玛丽琳·斯通 (Marilyn Stone)、凯莉·古特曼 (Kellie Gutman)、詹姆斯·穆勒 (James Muller)、亚历山大·林哈尔斯 (Alexandre Linhares)、克里斯托弗·韦德曼 (Christoph Weidemann)、纳撒尼尔·夏尔 (Nathaniel Shar)、杰里米·夏尔 (Jeremy Shar)、阿尔伯托·帕尔梅加尼 (Alberto Parmeggiani)、阿莱克斯·帕西 (Alex Passi)、弗朗西斯科·比安奇尼 (Francesco Bianchini)、弗兰西斯科·拉拉达美尔 (Francisco Lara-Dammer)、达米恩·苏利文 (Damien Sullivan)、阿布西吉特·马哈巴尔 (Abhijit Mahabal)、卡罗琳·斯特罗贝 (Caroline Strobbe)、艾马努埃尔·桑德尔 (Emmanuel Sander)、格兰·沃尔瑟 (Glen Worthey) ——当然还有我和卡尔的两个孩子，丹尼 (Danny) 和莫妮卡 (Monica)。

印第安纳大学长期以来为我个人和我的研究小组 (流动类比研究小组，简称“FARG”) 提供了无比慷慨的支持，我对此深表谢意。大学里几位重要的同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维护着 FARG 的运转，他们是海尔加·凯勒 (Helga Keller)、莫尔迪莫·罗文格鲁布 (Mortimer Lowengrub)、托马斯·艾尔利希 (Thomas Ehrlich)、肯尼斯·格罗斯·路易 (Kenneth Gros Louis)、肯博·苏巴斯瓦米 (Kumble Subbaswamy)、罗伯特·古德斯通 (Robert Goldstone)、理查德·席福林 (Richard Shiffrin)、米歇尔·杜恩 (Michael Dunn) 和安德鲁·汉森 (Andrew Hanson)。他们所有人都是智慧过人的伙伴和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有的已经与我合作了数十年。我很幸运能与他们共事。

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把我自己当作基本图书公司（Basic Books）的一分子了。我很感激那里的很多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对我的照顾。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与威廉·弗卢赫特（William Frucht）紧密合作。对于他的思想开放性、他出色的建议和从不欠缺的热情，我真的深感钦佩。

有几个人为本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肯·威利福德（Ken Williford）和尤赖亚·克里格尔（Uriah Kriegel）促成了这本书的启动；凯莉·古特曼（Kellie Gutman）、斯科特·布莱希（Scott Buresh）、比尔·弗卢赫特（Bill Frucht）、莫大伟和劳拉·霍夫施塔特提前阅读了部分草稿并给出了极为关键的建议；而海尔加·凯勒则为拿到各种许可而四处奔波。我感谢他们付出的一切。他们的付出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本职。

上面提到的很多朋友，以及未及在此提及的朋友，形成了一片“云”，而我飘浮其上；有时候我把他们想象成一片“大都市区域”，而我正处于城市之内。每个人都有朋友。在这个意义上，我跟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片云是我的云，它以某种方式定义了我。我为此感到骄傲，我为他们所有人而骄傲。所以我要用我的全部真心对这片朋友的云说：“感谢你们，感谢每一个人！”

序言

一位作家和他的书

直面意识的物理性

我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在思索自己的思维究竟为何物，以及推而广之，一切思维均为何物。我还记得自己曾努力地想要理解，我是如何编造出了那些一语双关的俏皮话、如何生发了那些数学观念、如何在讲话时出现了诸般口误以及如何凭空想象出了那些奇妙的类比，不一而足。我想知道做一名女孩子、身为说另一种语言的母语者、成为爱因斯坦、变成一条狗、一头鹰，甚至一只蚊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大体而言，这段时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存在。

在我12岁那年，一团深深的阴影笼罩了我的家庭。残酷的现实摆在我的父母、我17岁的姐姐劳拉以及我自己的面前：那时年仅3岁的茉莉，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出了大毛病。没人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茉莉就是没法理解语言，也不能开口说话（她到现在依然如此，而我们始终没能找到症结所在）。她游刃有余地行于世间，甚至还带着一身优雅和魅力，可是她从不说话。这真是太令人难过了。

在很多年里，我的父母遍寻各种可以想见的途径，包括进行某种脑部手术的可能，但他们这种求索治愈之方或至少是某种解释的努力却只渐渐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之中。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对茉莉所处的困境展开了痛苦的思考，并想象着人们敲开我小妹妹的脑袋，窥视填充其中的神秘物质（这条

途径到底也没有采用)。这种可怕的想法刺激我阅读了几本讲述人类大脑的入门书¹。这些阅读于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迫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意识以及作为一种存在或拥有物的“我”的物理基础²，它让我深感迷失、眩晕与极其的怪诞恐怖。

正是在那段时期，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夕，我与来自伟大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的神秘的元数学启示不期而遇，而且我还学会了如何编程。我使用的是斯坦福大学当时拥有的唯一一台电脑，巴勒斯220 (Burroughs 220)。它被安置在破旧的“栎木学堂”(Encina Hall)的地下室里，那里昏暗隐蔽，恰合人意。我很快就对这台“巨大的机器大脑”上了瘾：它的橘色的指示灯以一种富有魔力的奇怪方式闪烁不定，揭示着它的“思想”；而它在我的指令下发现了优美的抽象数学结构，还用我正在学习的各种外语创作出古怪无常而荒诞不经的篇章。我与此同时还渐渐陷入了对于数理逻辑(symbolic logic)的痴迷之中：那些晦涩难解的符号踩着奇妙的魔法步点翩翩起舞，反照出种种真实、虚假、猜测、可能性与反事实性；而且我确信，经由数理逻辑，可以瞥见人类思想隐匿泉眼的深处。关于符号与意义、模式与理念、机器与心智、神经冲动与凡世灵魂等等一切想法不断翻腾，结果就是，我青春期的大脑里一片混乱。

幻景

这些观念的迷云，不仅在理智上吸引着我，也同样在情绪上牢牢地抓住了我。大约在我十六七岁的某一天，我正屏气凝神地冥思这些观念，忽然如梦初醒，而且自此以后始终认为，我们口中所称的“意识”，不过是一种幻景。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幻景，因为这种幻景可以察觉到自身，而且显然它并不相信自己察觉到的是一种幻景；但不论如何，它终究还是一种幻景。这种名为“意识”的狡猾现象仿佛是倒提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举了起来，它仿佛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身，然后每当有人想更仔细地

观察它时，它又自行瓦解，回归虚无。

我太过痴迷于弄清楚活着、作为一个人以及拥有意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甚而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把飘忽易逝的思想努力地捕捉在纸面之上，以免它们飞逝溜走，一去不还。于是，我坐了下来，写下了一段发生在两名假想的同代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我任意地将这两位哲学家命名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我对真正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无所知）。那也许是我笔下所写的第一篇严肃文字；不管怎么说，我是为它感到骄傲的，并从未将其丢弃。虽然现在回头再看我杜撰的这两名希腊哲学家所写的对话，未免太过幼稚和不堪，更别提它有多么粗陋；可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定把它作为引言收入本书，因为它蕴含了书中的诸多观念，而且在我看来，它可以为整本书奠定一种令人愉悦而又充满挑衅意味的基调。

xii

投向裂缝中的一声呐喊

大约过了10年以后，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当时设想的题目是“哥德尔定理与人类大脑”，首要的目标是把人类自我的概念与意识的谜团同哥德尔的震撼发现联系起来。哥德尔在一座令人望而却步的城堡的正中央发现了一个宏伟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结构，尽管大胆的建筑师早已把一切自我指涉无情地驱逐在外（用我后来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怪圈”）。哥德尔从无意义符号的基底上奇迹般地造出了自我指涉，而自我和灵魂也从由无生命物质组成的基底上奇迹般地现身，二者之间如此惊人的相似性令我确信，我们之所以能感知到“我”，秘密正在于此，而我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这本书也由此诞生（并改了一个更抓人眼球的书名）。

这本书于1979年面世后，大获成功。事实上，该书作者此后的人生轨迹，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这次极大的成功。可不管这本书有多么通行畅销，仍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集异璧》（我总是这么称呼它，人们通常也习惯了这种叫法）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根本性信息似乎被广泛地忽视不见。人们

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喜欢上了这本书，却极少甚或没有人是看中了其最为核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光阴流转，我在自己后来出版的其他书中，屡次转引或补充了那份核心的信息，可我早在《集异璧》中已经切实在尽力陈明之义，似乎仍然没有收获多少理解。

1999年是《集异璧》出版20周年，基本图书公司的伙计们请为一个新出的特别纪念版作一篇序言。我很喜欢这个主意，所以就答应他们写了一篇。在这篇序言里，我讲述了有关这本书及其变迁始末的各种逸事，还特别描述了我对于这本书接受情况所感受到的绝望和沮丧。我在文末留下了这样一句抱怨话：“我有时候会感觉，我朝着一个空荡荡的裂缝呐喊出了一句自己深为珍爱的消息，结果无人听闻。”

不想到了2003年的春天，我有一日忽然收到来自两名年轻哲学家的一封相当友好的电子邮件。肯·威利福德和尤赖亚·克里格尔正在编纂的一套被他们称为意识的“自我指涉主义理论（或学说）”的选集，他们邀请我为这本书执笔贡献一个章节。他们热切地鼓励我加入，甚至还引用了我自己在那篇序言中发出的哀叹反过来劝说我，提出这可以给我提供一次真正能够改变一些事情的机会。他们对于我想传达的核心信息表达出真挚的兴趣，这让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而他们的热情也令我感动。同时，我也认识到，为他们的编书计划出一份力，确实是我的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借此再次尝试申明我的观点，而且面向的又是刚好合适的行家听众——钻研思维的哲学家。所以，接受他们的邀请，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从雄壮的多洛米蒂山脉到温婉的布卢明顿

我在安泰塞尔瓦·迪·梅佐的一家恬静而朴素的旅店房间里开始写作我的章节。这个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村坐落于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山群，距离奥地利的边界线只有一箭之地。美好怡人的环境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迅速挥笔写就了10页到15页之多，并以为自己大概已然完成了一半。然后，我返回印

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家中，继续坚持不懈地埋头写作。

完成这个章节的写作，花费了远比我预料之中更长的时间（我的一些读者应该能认出，这正是侯世达定律³（Hofstadter's Law）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个定律说的是：“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是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使你的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更糟的是，这个章节的长度最终膨胀到了约定篇幅限制的5倍——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是当肯和尤赖亚最终收到这篇文章时，他们对于我写的内容十分满意，对于我的轻率不慎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他们实在太过热切地想要让我加盟他们的编著了，于是表示他们可以接受加长篇幅的一章。特别是肯，他甘心付出额外的功夫，帮我把文章砍掉了一半。

与此同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创作的内容绝不止于一本书的章节——它自己也可以成为一本独立的著作。于是，原本是由单一项目开始的工作，渐渐一分为二。我为自己写成的那一章文字所起的题目是“作为一个怪圈是什么样的”，呼应了心灵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讨论意识之谜的著名文章“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⁴（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而我为自己准备创作的那本书起了一个更加简短也更为亲切的题目：“我是个怪圈”。

肯·威利福德和尤赖亚·克里格尔合编的《意识的自我表征理论方法集》（*Self-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Consciousness*）于2006年春面世。我的文章排在全书的最末，收在一个包含两章的板块之下，板块的标题是“超越哲学之外”（至于为什么说它超越哲学之外，实在也超越了我的认知，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相当喜欢这个创意的）。我无法确定，在那种卓越而又相当专业化的设定下，这套观念能否对任何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可我确实对自己的这本书抱以厚望，希望本书作为这些观念丰满完整且更加清晰显见的具象化形式，能够让这些观念触及形形色色的人，不论其居于哲学内外，不论老少，不论专家或门外汉，均可为他们提供一种关于自我和灵魂（当然包括那些环路模式！）的全新想象。无管怎么说，我都欠了肯和尤赖亚一个很大的人情。他们助我擦亮了本书创作最初的火花，而且一路上都给予我极大的鼓励。

就这样，在大约过了45年之后，（我的天哪！）我绕了整整一圈，再次拿笔书写起有关灵魂、自我和意识的文字，并迎面撞上了我在少年时代就曾首次体验过的那种未曾改变的神秘与恐怖。我还记得，那种令我们成为我们的物理法则，既糟糕透顶，又美妙惊人，10多岁的我在为此感到恐惧的同时，也痴痴地沉醉其中。

一位作家和他的读者

不要被这本书的标题迷惑，它讲述的并不是我，而是“我”这个概念。因此，它与你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与它和我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差异。我完全可以把题目改成“你是一个怪圈”。实话实说，要想更清晰地表达出这本书的课题和目标，我可能应该将其命名为“‘我’是一个怪圈”——可你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厚实的书名吗？不如干脆把它改成“我是一个铅球”得了。

不管怎样，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关于“我”为何物的庄严话题。那么它面向的读者应该是哪些人呢？同以往一样，我的写作总是为了影响那些接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我几乎从来不为专家们写作，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位真正的专家。噢，我要收回这句话；这样说不公正的。毕竟，站在我人生的现阶段回首而视，我已经花了近30年的时间⁵，同我的学生们一起钻研类比推理与创造力的计算模型，观察并记录了各式各样的认知错误，收集了归类与类比的各种范例，研究了类比在物理与数学中的核心地位，深析了幽默的机制，推敲了概念创造与记忆提取的方式，并探索了词汇、习语、语言和翻译等所有的面向——而且在这30年中，我一直在讲授涉及思维的诸多方面以及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研讨课程。

所以，没错，说到底，我算是某种专家，而我的专长正在于对思考本身的思考。确实，正如我在前文所述，从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开始，我对于这个话题始终燃烧着热情。而我最为确信的结论之一便是：我们总是通过寻找并勾连与我们过去所知事物之间的类似性来进行思考的。因此，当我们

利用大量丰富的例子、类比与隐喻之时，当我们回避了抽象的概括之时，当我们运用实际的、具体实在而简单朴素的语言之时，以及当我们直接谈论我们自己的经历之时，我们才能展开最有效的交流。

小马小狗教

多年以来，我都热衷于被我自己称为“小马小狗”的自我表达风格。这个说法的灵感来自著名卡通《花生》(Peanuts)中讨人喜爱的一话。我在这里节选了这集漫画。

xv

我常常产生和最后一格中的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完全相同的感受，就好像自己是一个想法与“在云间”扯不上半点关系的人，为人很实际，以至于为此感到难堪。我察觉到，有些读者对我形成了一种十分错误的印象，认为我具有一种极其渴望并且不懈追求最高级别抽象化的思维。我与此正好相反，而且我希望，阅读本书能让这一点更加明白无误。



至于我为什么把查理·布朗在此嘟囔的那句酸酸的话错记成了“小马和小狗”，我自己是浑然不知的，但这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微改编，已经成为我个人言语中一个固定表达，所以不管是好是坏，它都成为我一直以来用以描述自己教学风格、演讲风格和写作风格的标准评语。

xvi 也许部分得益于《集异璧》这本书的成功，我在自己供职的两所大学里都幸运地享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印第安纳大学（大约25年时间）和密歇根大学（80年代的4年间）的慷慨包容令我得以奢侈地探索自己千变万化的兴趣课题，而不必承受“不发表则灭亡”的学术压力，或者还有更糟的追逐基金的无情重压。

我没有走上那种在专业杂志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论文的标准化学术路线。当然，我也发表过一些“真正的”文章，但是我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以著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书的写作向来着眼于清晰度的最大化。

清晰、简明和具体，联合成为某种我所信奉的宗旨，包含了一整套需要时刻铭记的指导原则。幸运的是，很多善于思考的人都欣赏类比、隐喻和举例，赞同对行业术语的相对削减，而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认可从第一人称立场发出的言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为了那些欣赏本书写作方式的人，而我所有的其他著作也都是如此写成的。我相信，这群读者不仅覆盖了业外人士与业余爱好者，也包括了众多专业的心灵哲学家。

如果你觉得，我在本书中讲了太多第一人称的故事，那并不是因为我沉迷于个人的生活之中，并自欺欺人地认为它相当重要，而只是因为这才是我最了解的生活，而且它还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范例，我猜这足以反映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典型特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要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才能对抽象的观念形成最清晰的理解，所以我在传达艰涩和抽象的观念时，总会尽量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媒介。但愿有更多的思想者使用第一人称的风格写作。

虽然我也希望以本书中的观点与哲学家们展开对话，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并不太像一名哲学家。在我看来，很多哲学家都以为，他们可以像数学家一样，切实地证明他们相信的观点，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常常使